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新中国60年·学界回眸

社会学与社会建设卷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组织编写
本卷主编 郑杭生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新中国60年·学界回眸

社会学与社会建设卷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组织编写
本卷主编 郑杭生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60年·学界回眸. 社会学与社会建设卷 /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编写; 郑杭生分册主编.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200-08098-8

I. ①新… II. ①北… ②郑… III. ①社会科学—科学研究事业—成就—中国—现代②社会学—成就—中国—现代③社会发展—成就—中国—现代 IV. ①C12②C91③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7872号

新中国60年·学界回眸

社会学与社会建设卷

XIN ZHONGGUO 60 NIAN · XUEJIE HUI MOU

SHEHUIXUE YU SHEHUI JIANSHE JUAN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组织编写

本卷主编 郑杭生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1092 16开本 19印张 292千字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200-08098-8

C·523 定价:41.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新中国 60 年·学界回眸》

编委会

顾问 满运来

主任 常卫 史秋秋

副主任 陈之昌 曲仲 王祥武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振民 王祥武 文魁 史秋秋

曲仲 刘勇 刘娟 刘蓉

杨钢 李兴洲 李建平 张颐武

陈之昌 金梦玉 郑红霞 郑杭生

段霞 施雪华 秦宣 常卫

崔新建 葛晨红 翟振武

本卷编委会

主 编 郑杭生

副主编 洪大用 杨 敏 陆益龙（执行）

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建民 王道勇 刘仲翔 杨 敏

奂平清 陆益龙 陈 云 郑杭生

洪大用 黄家亮



前 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书，是我们献给新中国 60 华诞的一份厚礼。

60 年光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然而，新中国的 60 年，对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历史而言，却可歌可泣，意味深长。这 60 年，彻底改变了自 1840 年至 1949 年一个多世纪间旧中国内忧外患的悲惨命运，使一个独立而强盛的新中国骄傲地屹立在世界东方。每一个为此作出贡献的团队，都会情不自禁地回眸自己一路走来的坚实脚步，为着风雨兼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带着这样一种理念和情感，我们策划了《新中国 60 年·学界回眸》这套书。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30 年来，哲学社会科学不断繁荣发展，在认知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新中国的辉煌 60 年，从学界角度来理性思考、进行梳理，是首都社会科学界的光荣职责。经过多次与专家、相关学会负责人、出版社反复研究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将该套书定位在立足我国和北京改革开放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学界的视角审视 60 年来社会科学界的伟大成绩，着力总结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哲学、经济、人口、社会、政治、法治、教育、文学、伦理、文化、新闻、国际关系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首都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提供的理论支撑。通过梳理和总结 60 年来各学科的重点事件，阐明各学科的重要理论建树，最终展现本学科理论上的重大成果，从而形成本学科理论和社会实践的互

动。

在本套书的策划过程中，我们组织多种学科的专家学者，深入探讨实现上述主旨的途径和方法，其中包括要尊重每种学科各具特点的发展状况，采用不拘一格的方式占有资料，归纳概括，著述成书。在实际撰写过程中，专家们虽都感到了创作的难度，但仍积极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书中难免有缺憾之处，恳望读者不吝赐教。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09 年 12 月



目 录

总论：走向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资源配置格局

——新中国 60 年社会发展和建设成就 (1)

引 言 (1)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 30 年社会变迁的总体特征 (2)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 30 年的社会变迁总体特征 (16)

第三节 中国社会发展前瞻：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 (34)

第一章 社会结构变迁的轨迹 (44)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确立 (44)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社会结构特征 (49)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 30 年的社会结构变迁 (54)

第四节 小结 (64)

第二章 社会体制建设越来越受关注 (66)

第一节 新秩序对社会体制建设的要求 (66)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社会体制建设经验 (71)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 30 年的社会体制建设成就 (76)

第四节 小结 (84)

第三章 文化变迁过程中的价值重构 (86)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文化的重构 (86)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文化价值观变迁 (94)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 30 年文化价值观的分化 (97)

第四节 小结 (104)

第四章 农村发展与建设成就 (106)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和农村的快速发展 (106)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农村发展 (112)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 30 年农村的快速发展	(116)
第四节	小结	(127)
第五章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建设	(129)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发展与城市管理	(129)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城市社区建设	(135)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 30 年城市快速发展中的社区建设	(139)
第四节	小结	(149)
第六章	逐步走向融合的城乡关系	(151)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的协调发展	(151)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 30 年城乡二元体制	(157)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 30 年城乡关系逐步走向融合	(161)
第四节	小结	(170)
第七章	教育机会获得机制走向公平合理	(172)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机会获得机制	(172)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教育机会获得机制	(175)
第三节	改革开放 30 年教育发展与教育机会获得机制创新 ..	(180)
第四节	小结	(198)
第八章	医疗卫生体制的重要成就	(200)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医疗卫生体制及特征	(200)
第二节	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卫生体制	(205)
第三节	市场转型过程中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	(212)
第四节	小结	(222)
第九章	就业体制从计划分配走向自主择业	(223)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对灵活的就业体制	(223)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 30 年计划分配的劳动就业体制	(227)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 30 年劳动就业体制的变迁	(231)
第四节	小结	(241)
第十章	收入分配机制变迁的积极意义	(243)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确立	(243)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 30 年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机制	(247)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 30 年市场转轨带来收入差距	(251)
第四节	小结	(259)



第十一章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261)
第一节 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创立	(261)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 30 年社会保障制度概述	(268)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发展	(274)
第四节 小结	(289)
后记	(292)



总论：走向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资源配置格局

——新中国 60 年社会发展和建设成就

引 言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60 年发展和建设的辉煌成果，标志着我们祖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中国对人类和世界发展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 60 年发展和建设之路很不平坦，取得成果极不容易。这是一条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探索新社会、新制度建设的艰险崎岖之路，是一条克服千难万险、勇往直前、可歌可泣的好事多磨之路，没有曲折、没有艰辛倒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与初始水平同我国差不多，甚至比我国高的亚洲、拉美一些发展中的大国比较，经过 60 年发展和建设，我国取得的成就是尤其值得自豪的。

新中国 60 年发展和建设之路，按照改革开放为界，大体可以分为两个 30 年：改革开放前 30 年（1949—1979）和改革开放后 30 年（1979—2009）。因此，要正确看待新中国 60 年，首要前提是要正确处理好这两个 30 年的关系。

如果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地看待这两个 30 年的关系，我们必须承认：前 30 年既为后 30 年打下了基础，又为后 30 年留下了问题^①。因此，既不能用后 30 年来否定前 30 年，也不能用前 30 年来否定后 30 年。用后 30 年来否定前 30 年，就是无视前 30 年为后 30 年打下了基础的一面，就

^① 郑杭生：《改革开放 30 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2 期。

是无视前 30 年本身取得的伟大的基础性的成就；而用前 30 年来否定后 30 年，则是无视前 30 年为后 30 年留下的问题的一面，就是无视后 30 年本身取得的伟大的发展性的成就。

本导论以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格局为主线，来分析新中国 60 年来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 30 年社会变迁的总体特征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是中国人民创造自己历史的新的起点，是中华民族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转折的里程碑。它标志我国从善于破坏旧世界转变到善于建设新世界的转变。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①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也意味着从过去千难万险的“革命为民”转变为此后充满挑战的“执政为民”，开始了新的万里长征。

一、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进入新时期

新中国成立只是为“建设新世界”创造了现实可能性，但是要把这种可能性真正变成现实，必须战胜诸多的困难和挑战。

（一）“建设新世界”的艰难性

新中国成立时所面对的客观条件和环境十分严峻。

从国际上看，当时正处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格局和大背景下，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的是包围和封锁政策，时刻企图扼杀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向新中国伸出援助之手。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在外交上别无选择，不能不实行“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就像毛泽东所说的：“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 40 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第 1439 页。



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①

从国内的情况看，形势同样严峻：

第一，我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949年我国的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仅为10%，我国的城镇人口也只是总人口的10.6%。这两个10%，表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水平很低。发展的初始水平很低，我国社会还是一个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型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型的任务十分繁重。

第二，新中国经济建设起步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长期战争造成了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整个社会百业待兴、百废待举。据统计，1949年与历史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50%。粮食产量减少近25%，棉花产量减少48%。铁路只有近万公里线路通车，3200多座桥梁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政府滥发货币造成通货恶性膨胀，市场物价猛涨。1949年城市中失业人数约有400万人，农村灾民约4000万人，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新中国成立后，必须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以巩固人民政权，改善人民生活，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

第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等任务还未完成，解放战争还在继续，土匪尚未肃清，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还很猖獗，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急待清除，新中国面临繁重的社会改造任务。

所有这些意味着“建设新世界”的艰难性、复杂性、繁重性。

（二）“建设新世界”的制度选择

“建设新世界”，从内容上看，首先就是要建设与旧社会不同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制度和体制，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和体制的创造创新过程的开始。制度和体制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格局和方式。创立新的制度和体制，也就是以新的社会资源配置格局和方式来取代原来旧的社会资源配置格局和方式。

所谓“社会资源”，其内涵是指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人力、财力、物力、机会等生产和生活资料。社会资源的外延，按不同划分标准，可分为可再生资源 and 不可再生资源，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和非经济资源，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硬资源和“软”资源等。人们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1页。

还经常按不同领域来划分广义的社会资源，于是又有了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生活资源等。人们还按照公私关系，把社会资源分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①。从性质上看，社会资源都是价值性、有限性和主体性的统一。

所谓“社会资源配置”是指上述各种资源在各种不同的使用方向之间的分配。社会资源配置，大体可分为合理的和非合理的配置，有效的和非有效的配置，低效的和高效的配置。只有选择合理的、高效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才能使有限资源的开发利用达到最佳效果。

对新中国来说，改变社会资源配置格局，最首要的就是把过去有利于“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不合理的、低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改变为有利于中国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当家做主、共享胜利成果的合理的、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个问题，用更学术化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把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应该通过选择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和体制，选择什么样资源配置方式来实现。

在制度上，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文化制度是文化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制度，社会管理制度是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自己做主、自己管理社会生活领域内的各种事务。

在体制上，政治体制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把经济事务包下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是高度集中的把文化事业包下来的文化管理体制，社会体制是高度集中的把社会事务包下来的社会管理体制。当时所有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社会组织都是政府组织的延伸，分别承担了办企业、办文化、办社会的职能。其中，经济体制就是社会资源中最基本的资源——经济资源的配置格局和方式。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也是相应的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生活资源的配置格局和方式。

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 1949 年至 1952 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① “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指具有外在性、共享性、垄断性的资源，如国防、公安系统、公共道路、环境保护以及制度规则等。“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则指具有独立性、排他性、竞争性的资源，这类资源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兼有公共物品性质和私人物品性质的资源，如自来水、电力、教育、卫生、信息服务等。他们既有公共物品的经营垄断性又有私人物品的消费排他性。参见陈振明主编《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 3 月版，第 224 页。



的时期初步形成的，并于1954年以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①这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前30年中国配置包括经济资源在内的社会资源的主要形式，它作为经济基础，也深深地影响着其他制度和体制。

新中国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制度和体制？这是由历史原因和现实情况、国内外的形势、主客观的具体因素决定的。这里着重以当时为什么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为例来加以分析。

新中国之所以选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之一，就是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个别企业的有组织状况。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它与生产的社会化是一致的。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克服社会经济的无计划状态，而进行有计划的发展。由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很长的时间内把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在1953年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假如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②这意味着：要搞社会主义，就要选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二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新中国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除了苏联经验，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循。当时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表现出强烈的示范作用，而它的弊病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在经济体制上，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苏联选择计划经济的理由，也几乎和后来新中国的选择一样，一方面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理论，另一方面是苏联自身所处的客观环境的需要。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前后，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战争一触即发，备战和抵御外敌入侵成为苏联的首要任务。在这种环境下，苏联必须在经济上高度集中财力、物力、人力由中央使用。正是采取这种办法，苏联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国民经济计划化，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能与资本主义国家抗衡的强国，保证了后来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胜利。苏联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那个时期充分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性。这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不能不有强烈的示范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诞生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照搬了它的经验，新中国也没有例外。

三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新中国经济建设起步时的实际情况。新中国成立初期，战争还在继续，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还在进行，各种物资，特别是老百姓生活必需品极为短缺，投机商人乘机捣乱。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为了使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的地方，必须实行计划管理，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选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正确的。如果当时不采取这种体制，就不可能取得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成就。事实证明，新中国学习苏联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且在一个时期内明显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①。

由此可见，对于计划经济体制，要用历史的眼光进行具体分析，它所起的历史作用必须肯定，不能一笔抹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是逐渐暴露而为人们逐步认识到的，这些弊病表明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我们很同意这样的观点：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与评价的研究，只有把它放在新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背景中，才有深入思考的真正可能与实际价值。计划经济体制作为历史的选择与存在，必然有其选择与存在的理由，也必然有着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价值。这种价值，除了积累经验，还应该有为近30年的中国计划体制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基础的作用。否则，许多问题就难以理解，也不符合历史的逻辑^②。

① 廖心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试论毛泽东、邓小平对我国经济体制的探索》，载人民网。

② 钟瑛：《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与评价研究述评》，载《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



二、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资源配置格局

如上所述，新中国前30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由国家集中计划分配、管理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当时资源配置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与国家相对独立的市场和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在实际生活中，就表现为“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

那么，这个体制是如何具体运作的呢？也即国家如何把各种社会资源分配给作为国家延伸的各类社会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又如何把不同的社会资源分配给自己的社会成员呢？这就不能不涉及前30年新中国实行的三项重要的“次级制度”：单位制、行政制和身份制。所谓“次级制度”是指从属于基本制度，又为落实贯彻基本制度服务的具体制度。在新中国前30年，单位制、行政制和身份制就是这种为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服务的具体制度。

（一）“单位制”与“行政制”

所谓“单位制”，主要是指由国家集中计划、管理的各种社会资源，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单位”进行实际运作和操作的。这里所说的“单位”，是社会组织的一种特殊形式，实际上是国家组织的外延产物，其功能和活动方式、范围都是国家分配的结果^①。

中国主要有这样几类单位：

首先是单位化程度最高的党政机关、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它们作为国家组织及其附属物，既受到国家全面直接的控制，也受到国家组织全面而直接的保障。

其次是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它们依照国家计划的分类也由国家“归口”管理。与全民所有制单位相比较，它们在形式上具有相对的“自主权”。但是，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占绝对优势并控制大部分重要社会资源的状况下，这种“自主权”不过是对国家不完全保障的一种弥补。

再次是农村各类集体经济单位。过去“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受到许多行政控制的同时，除了因重大灾害等可享受国家救济外，主要是“自负盈亏”。因而农村集体经济单位在国家若干直接强制之外（如统购统收、统购统销等），享有较多的“自主权”。它的单位化程度最低，一般称为“不完全单位”。但是，在绝大多数资源由国家直接控制并从农村调往城镇

^① 路风：《单位：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载《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